

中国文学百家精品文库

王克俭 主编

95

梁实秋散文选



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

本丛书编委会

主 编：王克俭

副 主 编：邓先明

编写人员：简文 张哲生 成立君 王丽霞
王南 吴连根 孙凌曦 孙宾贺
张惠 张金方 邓先明 王克俭

策 划：北京汉洲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目 录

梁实秋小传	(1)
南游杂感	(8)
雅舍	(16)
孩子	(19)
女人	(23)
男人	(27)
脸谱	(30)
中年	(34)
送行	(37)
鸟	(41)
骆驼	(44)
散步	(47)
放风筝	(50)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	(55)
我的一位国文老师	(58)
记张自忠将军	(62)
退休	(66)
怒	(69)
排队	(71)
喝茶	(75)
忆冰心	(79)

山杜鹃	(89)
拔卓特花园	(93)
旧	(101)
读画	(104)
梁实秋散文赏析	(107)

梁实秋小传

梁实秋，名治华。1903年生于北京。父亲是前清秀才，后曾入同文馆攻习英文，以后在京师警察厅任职。母亲是杭州人，颇有学识，治家很严。他五六岁起即在家中识字描红。191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京师第三小学毕业，随后又考入清华学校，经中等科后又升入高等科，在“水木清华”的校园里度过了八年难忘的岁月。1920年前后，受“五四”新文学影响，他开始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与闻一多、朱湘等同学组织了“清华文学社”，担任《清华周刊》的文艺编辑。这一时期，发表了不少情思词丽的新诗和颇具慧眼的诗评，显示了不少文学才华。清华期间，他与闻一多合作出版了一本《冬夜草儿评论》，受到了郭

沫若的赞赏，梁实秋因此而与创造社建立了联系，他后来有不少作品都发表在《创造》上。

1923年初秋，他从清华毕业后来到了美国，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和哈佛大学等地研读英美文学批评。留美期间，虽然在创作上无甚成就，但这三年对于他的一生来说，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他在哈佛做白璧德教授的研究生时，对白氏的新人文主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此他从青春的浪漫转到了传统的古典，成了一位古典主义的批评家。

1927年春，他为避北伐兵乱，从南京来到上海，在《时事新报》编辑《青光》副刊。从五月始至八月初，他以“秋郎”的笔名在副刊上发表了百来篇小品，这年十月，他将这些文字择选了47篇编成《骂人的艺术》一书，交由新月书店出版。这一时期，他除了在大学授课外，还参加了新月书店和《新月》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1927年11月，他在《复旦旬报》上发表了一篇《卢梭论女子教育》，文章表现了一种明显的旧派意识和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傲然态度，立即遭到了鲁迅的驳击，由此揭开了双方的一场论战，以后又涉及了文学翻译、文学的阶级性诸种问题。这场论战，表现出了自由主义文人与左翼文坛之间在思想意识和文学观念上的严峻对立，这种对立实际上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的严峻复杂的社会政治情势。与此同时，梁实秋又因在《新月》上发表了一些抨击时政的文章，而得罪了政府当局，《新月》杂志也因此而遭到查封。1930年，梁实秋因不堪“沪上的尘嚣”，遂与闻一多一起来到了风清气爽的青岛大学任教。四年后又应胡适之邀回到了故乡担任了北京大学外文系主任。这一时期，他主要从事教学、翻译和文学批评工作，先后出版了《浪漫的与古

典的》、《文学的纪律》、《文艺批评论》、《偏见集》四本论文集。1935年，他在北平创办了《自由评论》杂志，评议时政，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1937年七月初，他应蒋介石之邀上庐山参加了商议国事的学界名流谈话会。“七·七”事变以后，他为避日本宪兵的捕杀而只身匆匆南下，后又随国民党政府入川，在国立编译馆负责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入蜀以后，他又重新操起了散文的笔，在《星期评论》等杂志上辟设“雅舍小品”专栏，发表了20篇散文。抗战结束后他回到了北平任教，在《世纪评论》上又发表了14篇，于1947年结集准备出版，后来由于战事迭起，终于未能付梓。1949年他东渡台湾后，这本《雅舍小品》即由正中书局在台北出版，受到了各界读者的重视，至今已发行了五十余版。入台以后，他在教学之余，埋头著译，以一人之力译出了《莎士比亚全集》40卷，并在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散文，结集出版的有：《谈徐志摩》、《清华八年》、《秋室杂文》、《谈闻一多》、《秋室杂忆》、《西雅图杂记》、《雅舍小品续集》、《看云集》、《槐园梦忆》、《梁实秋札记》、《白猫王子及其他》、《雅舍小品三集》、《雅舍杂文》、《雅舍谈吃》、《雅舍小品四集》、《雅舍怀旧》等近20本散文集，成了台港及海外文学界赫然知名的散文大家。

梁实秋出生于一个充满书香气的旧式官僚家庭。父亲书房内的四壁图书，盈室轴卷，使他自小浸淫在古典的文化氛围中。家中旧式的礼规繁多，上下等级森严，年节忌日里的一系列祭祖拜神的典仪，最能体现出中国文化的传统。在幽深闭锁的大宅院内成长起来的梁实秋，无疑受到了这种传统文化的潜移默化的熏陶。在本世纪初年，梁家在经济上基本

属于中上层社会，自幼不愁衣食、不知饥寒的生活，与下层仆人禁绝的规矩，使他在精神上酿成了一种贵族式的优越感，一种与下层贫民间的情感隔阂。因此，对于现存的经济制度，现存阶级秩序，他缺乏一种强烈的政治变革的欲求，对于维系既存生活方式和既存社会秩序的儒家思想，在情感上具有一种亲切感，传统文化的熏陶和阶级门第的因素，以及他个人对于社会、人生的独特的经历，使得他的整个人生观呈现出一种比较保守、温和、陈旧的色调。

这种保守的人生思想，基本上贯穿于他一生的始终。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人生观是一锤既定便毫无变化的。事实上，他思想中的各种基因并不呈现为一种固定不变的恒态。大致说来，他的思想经过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识事后至遇见白璧德以前。这一时期他虽然深受家庭中文化氛围的影响，但这主要是一种被动的、无意识的接受，在思想上尚未形成一种明确的人生观。正值青春年少的时候，“五四”的洪流挟带着各种近现代的思潮滚滚而来。梁实秋贪婪地呼吸着新时代的空气，兴奋地渴望着加入新时代的行列。他衷心赞赏情感盈沛、想像瑰丽的郭沫若，崇拜飞扬蹈厉、蔑视传统的拜伦。在他身上，传统的保守气息基本上被青春的浪漫和热情盖过了。四十余首的新诗作最能体现出这一阶段的思想特色。但这种青春的浪漫没有持续很久就逐渐消失了，甚至可以说，这种青春的浪漫只是借着外来的风暴在他思想表层上暂时激起一片浪花，它并没有本质地反映出其思想内核的底蕴。因此当梁实秋进入了哈佛的白璧德讲堂后，这种青春的浪漫就彻底地崩溃了。他在白璧德面前感到惶恐，感到愧疚，同时又有一种涅槃后新生的愉悦感。从此他告别了青春

的浪漫，在思想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从总体上来说，这其实并不完全是一种质的变化。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究其实质，是一种保守的、尚古复旧的思想哲学，它只是一种古希腊文化、基督教文化、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四流合一的杂糅体，其根本要旨，即是力图恢复古典文化的精神和传统的秩序，以此来匡正和补救由近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带来的人欲膨胀、礼崩乐坏的弊病。正是这一点，使吴宓、梅光迪等人感到在西方找到了知音，也正是这一点，唤起了沉睡在梁实秋心灵深处的保守意识，他的一些朦胧的思想在白璧德的梳理下形成了一种创造社的成就，竭力推举传统的古典主义，并且以儒家“兼济天下”的入世精神，积极地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专制政策，强烈要求结束训政，取消党治，建立宪法政府，保障民权。这一时期，梁实秋的思想意识是传统保守的，但他的政治态度是积极进取的。然而1937年爆发的一场空前的民族战争，却使他的思想陷入了一场深刻的危机。入蜀是他思想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入蜀以前，儒家式的进取精神构成了他人生态度的一个主要方面，在埋首学问的同时，他胸中仍时时鼓荡着一种传统士大夫的匡世救弊的历史责任感。他因力主抗战而被北平的日本宪兵队列入了黑名单。但是他的政治热情和理想在一场空前规模的残酷战争中被重重地击毁了。南北流徙的逃亡生活几乎使他在炮火中丧生，与妻儿的离散更加深了他心头的郁悒，内心不觉滋生了一种人生无常的虚幻感。他痛苦地感到，在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一个知识分子的草芥之命竟是如此地无足轻重。当身为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在1938年底卖国通敌后，作为参政员的梁实秋痛苦的感到自己被政客们愚弄了。入蜀以后，他又亲眼

目睹了一些政治大亨大发国难财的种种劣迹，于是，他对现实政治几乎完全失望了。一种沉重的失落感和幻灭感充塞了他的心头。从自己前半生的经验中，他无可奈何地感悟到：“国政大事，非权要之人无力干预，官场龌龊，亦非正直之人涉足之所，区区书生，只能埋首做点学问聊慰平生而已”。“无在局，宁愿三缄其口”。因此当有朋友请他接编《中央日报》的《平明》副刊时，他在《编者的话》中发表了这么一段话：“现在抗战高于一切，所以有人一下笔就忘不了抗战。我的意见稍为不同。与抗战有关材料，我们最为欢迎，但是与抗战无关的材料，只要真实流畅，也是好的，不必勉强把抗战截搭上去”（《中央日报》1938年12月1日）。就词意来说，这段话并无偏颇之处，但也多少流露出了他当时的心境。曾遭到了左翼文艺界的激烈批驳。由于时代和政治的因素，其间夹杂了不少偏激之辞。这一段是非曲折，直至近年柯灵先生撰文论析，才基本得到了廓清。不过，入蜀确是梁实秋人生态度的一个转折点。他开始从“兼济天下”转到了“独善其身”，从追求外界事业的成功转到了追求内心生活的丰富，在人生哲学上，他逐渐不自觉地向老庄靠拢，日后并对佛禅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试图在巴山蜀水中寻求恬淡闲适的情趣，随心所欲不逾矩地充分享受人生的意蕴。他的《雅舍小品》，正是这样一种思想情绪的抒发，他以后的大部分散文，都是“雅舍”精神的延续。

梁实秋的散文起笔很早。他在清华做学生的时候就在杂志上发表了《南游杂感》、《清华的环境》等多篇作品，在上海编《时事新报》的时候，又专门出版了一本小品《骂人的艺术》。但严格地说，这只能算作散文家梁实秋的试笔。因为

在这些文章中，他尚未形成一种成熟的艺术风格。清华时期的作品，带有比较浓重的学生气，文笔清畅婉约，绘写细致真切，但稍嫌浅白、散沓。《骂人的艺术》，似乎又是另一种风格了。它大都取材于都市生活的一片一羽，然后用一种调侃揶揄的笔墨表现出来，虽然显出了一点诙谐风趣，但有些便不免流于肤浅浮夸，带上了一点人为的油腔滑调，总的格调不太高。此中选录的四篇是比较可读的，但与后期的散文相比，仍不免大为逊色。

真正奠定梁实秋散文家地位的，是他入蜀以后的《雅舍小品》。有一个现象很值得品味。梁实秋在中年以后十分爱读英国作家兰姆的《伊利亚随笔》和周作人的散文。这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中年以后的梁实秋，在历经了各种的风风雨雨和战争灾难以后，他的心境逐渐趋归于一种超脱式的恬淡宁静。因此，他在兰姆那充满着闲情逸致而又风雅幽默的笔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在周作人那雅淡冲和、氤氲着旧派士大夫气息的苦茶小品中得到了自己的情绪寄托。因此，他的作品，大都是从一己的人生经验出发，说古道今，谈人论物，在幽默诙谐中含蕴了几分讽刺，又在讽刺揶揄中透出了几分亲切和温厚。他后期的散文题材，大都取自平凡的日常人生，男人，女人，稚童，老者，无所不谈；洗澡，睡觉，喝茶，饮酒，无所不写，但都体现出一种清雅通脱的襟怀，逸发出几丝闲逸悠然的气息，颇有些东晋人的遗风和晚明人的潇洒。究其底蕴，实际上是一种对于人生的玩味。在晚年，他又写了大量的忆旧文字，保持了他清明雅洁的一贯作风，在平朴的记叙中，注入了深浓的情愫。

南游杂感

—

我由北京动身的那天正是清明节，天并没有落雨，只是阴云密布，呈出一种黯淡的神情，然而行人已经觉得欲断魂了。我在未走之先，恨不得插翅南翔，到江南调换调换空气；但是在火车蠕动的时候，我心里又忽自兢兢不安起来，觉得那座辉煌庞大的前门城楼似乎很令人惜别的样子。不知有多少人诅咒过北京城了，嫌他灰尘大。在灰尘中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我，却在暂离北京的时候感到恋恋不舍的情意！我想跳下车来，还是吃一个星期的灰尘罢，还是和同在灰尘中过活的伴侣们优游罢……，但是火车风驰电掣的去了。这一来不大打紧，路上可真断魂了。

断了一次魂以后，我向窗外一望，尽些些垒垒的土馒头似的荒冢；当然，我们这些条活尸，早晚也是馒头馅！我想我们将来每人头上顶着一个土馒头，天长日久，中国的土地怕要完全是一堆一堆的只许长草不许种粮的坟头了，经济问题倒还在其次，太不美观实在是令人看了难受。我们应该以后宣传，大家“曲辫子”以后不要在田地里筑起土馒头。

和我同一间车房的四位旅客，个性都很发达。A是一个小官僚，上了车就买了一份老《申报》和一份《顺天时报》。

B, C, D, 三位似乎都是一间门面的杂货店的伙计。B 大概有柜台先生的资格, 因为车开以后他从一个手巾包里抽出一本《小仓山房尺牍》来看。C 有一种不大好的态度, 他喜欢脱了鞋抱膝而坐。D 是宰予之流亚, 车开不久他就张着嘴睡着了; 睡醒以后, 从裤带上摘下一个琵琶形的烟口袋, 一根尺余长的旱烟杆。这三位都不知道地板上是不该吐痰的, 同时又不“强不知以为知”的, 于是开始大吐其痰。我从他们的吐痰, 发现了一个中国人特备的国粹, “调和性”。一口痰公然落到地板上以后, 痰的主人似乎直觉的感到一些不得劲儿, 于是把鞋底子放在痰上擦了几下。鞋底擦痰的结果, 便是地板上发现一块均匀的湿痕。(痰是看不见了, 反对地板上吐痰的人也无话可说了。此之谓调和。)

从北京到济南, 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着, 我并没有什么不满, 因为我知道这叫做“民众化”!

二

车过了济南, 酣睡了一夜。火车单调的声音, 使人不能不睡。我想诗的音节的功效也是一样的, 例如 Speuseian stanza, 前八节是一样的长短节奏, 足以使人人神, 若再这样单调下去, 读者就要睡了, 于是从第 X 行便改了节奏, 增加一个音。火车是永远的单调, 并且是不合音乐的单调。但是未来派的音乐家都是极端赞美一切机轮轧轧的声音呢。

一觉醒来, 大概是安徽界了罢, 但见一片绿色, 耀人眼帘; 比起山东界内的一片荒漠, 寸草不生的情形, 真是大不相同了, 全是良田。北方农人真是寒苦, 不要说他们的收获

不及南方的农家的丰富，即是荒凉的环境，也够为难受了。但是由宁至沪一带。又比江北好多了，尽是一片一片的油菜花，阳光照上去，像黄琉璃似的，水牛也在稻田里面工作着，山清水秀，有说不出的一股邕和的神情。似泰山一带的山陵，雄险峻危，在江南是看不到了。“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想近水的人真是智，不说别的，单说在上海从四马路到马霍路黄包车夫就敲我二角钱！

三

我在上海会到的朋友，有郁达夫郭沫若成仿吾。除了达夫以外，都是没会过面的文字交，其实看过《女神》、《三叶集》的人不能说的不认识沫若了。沫若和仿吾住在一处，我和达夫到他们家的时候，他们正在吃午饭。饭后我们便纵谈一切，最初谈的是国内翻译界的情形。仿吾正在做一篇论文。校正张东荪译的《物质与回忆》。我从没有想到张东荪的译本会居然有令人惊异的大错……。

上海受西方化的程度，在国内要首屈一指了。就我的观察所及，洋服可以说是遍处皆是，并且穿得都很修洁可观。真糟，什么阿猫阿狗都穿起洋装来了！我希望我们中国也产出几个甘地，实行提倡国粹，别令侵入的文化把我们固有的民族性打得片甲不留。我在上海大概可以算是乡下人了，只看我在跨马路时左右张望的神气就可以证实，我很心危。在上海充乡下人还不要紧，在纽约芝加哥被目为老魅，岂不失了国家体面？不过我终于是甘心做一个上海的乡下人，纽约的老魅。

除了洋装以外，在上海最普遍的是几句半通的英语。我很怀疑，我们的国语是否真那样的不敷用，非带引用英语不可。在清华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时常中英合璧的说话是不大好的，哪里晓得，清华学生在北京固是洋气很足，到了上海和上海的学生比比，那一股洋气冲天的神情，简直不是我们所能望其项背了。

四

嘉善是沪杭间的一个小城。我到站后就乘小轿进城，因为轿子是我的舅父雇好了的。我坐在轿子上倒也觉得新奇有趣。轿夫哼哈相应，汗流浹背，我当然觉得这是很不公道的举动，为什么我坐在轿上享福呢。但是我偶然左右一望，看着黄金色的油菜花，早把轿夫忘了。达夫曾说：“我们只能做Bougeoisie的文学，‘人力车夫式’的血泪文学是做不来的。”我正有同感。

嘉善最令我不能忘的两件事：便桶溺缸狼藉满街，刷马桶淘米洗菜在同一条小河里举行。这倒真是丝毫未受西方化的特征。二条街道，虽然窄小简陋，但是我走到街上心里却很泰然自若，因为我知道我身后没有汽车电车等杀人的利器追逐我。小小的商店，疏疏的住房，虽然是很像中古时期的遗型，在现代未免是太无进步，而我的确看出，住在这里的人，精神上很舒服，“乐在其中矣”。

这里有一个医院，一个小学校，一个电灯厂，还有一营的军队。鸦片烟几乎是家常便饭，吹者不知凡几。生活程度

很低，十几间房子租起来不过五块钱。我想大城市生活真是非人的生活，除了用尽心力去应付经济压迫以外，我们就没有功夫作别的事了。并且在大城市里，物质供给太便利，精神上感到不安宁的苦痛。所以我在嘉善虽然只住了一天，虽然感受了一天物质供给不便利的情形。但是我在精神上比在上海时满意多了。

五

我到南京，会到胡梦华和一位玫瑰社的张女士，前者是我的文字交，后者是同学某君介绍的，他们都是在东南大学。我到南京的时候是下午，那天天气还好，略微有些云雾的样子。梦华领我出了寄宿舍，和一个车夫说：“鸡鸣寺！怎么！你去不去？”车夫迟疑了一下，笑着说：“去！”我心里兀自奇怪，我想车夫为什么笑呢？原来鸡鸣寺近在咫尺，我们坐上车两三分钟就到了，这才怪车夫笑我们，我们下了车自己也忍不住笑起来。梦华说：“我恐怕你疲倦了……”

鸡鸣寺里有一间豁蒙楼，设有茶座，我们沿着窗边坐下了。这里有许多东大的学生，一面品茶，一面看书，似乎是非常的潇洒快意。据说这个地方是东大学生俱乐的所在。推窗北眺，只见后湖的一片晶波闪烁，草木葱茂。石城古迹，就在寺东。

北极阁在寺西，雨渍尘封，斑驳不堪了，登阁远瞩，全城在望。

南京的名胜真多，可惜我的时间太短促了。第二天上午

我们游秦淮河，下午我便北返了。秦淮河的大名真可说是如雷灌耳，至少看过《儒林外史》的人应该知道。我想像中的秦淮河实在要比事实的还要好几倍，不过到了秦淮河以后，却也心满意足了。秦淮河也不过是和西直门高粱桥的河水差不多，但是神气不同。秦淮河里船也不过是和万牲园松风水月处的船差不多，但是风味大异。我不禁想起从前鼓乐喧天灯火达旦的景像，多少的王孙公子在这里沉沦迷荡！其实这里风景并不见佳，不过在城里有这样一条河，月下荡舟却也是乐事。我在北京只在马路上吃灰尘，突然到河里荡漾起来，自然觉得格外有趣。

东南大学确是有声有色的学校，当然他的设备是远不及清华，他的图书馆还不及我们的旧礼堂；但是这里的学生没有上海学生的浮华气，没有北京学生的官僚气，很似清华学生之活泼朴质。清华同学在这里充教职的共十七个人，所以前些天我们前校长周寄梅到这里演说，郭校长说出这样一句介绍词：“周先生是我们东南大学的太老师。”实在，东大和清华真是可以立在兄弟行的。这里的教授很能得学生的敬仰，这是胜过清华的地方。我会到的教授，只是清华老同学吴宓。我到吴先生班上听了一小时，他在讲法国文学，滔滔不断，娓娓动听，如走珠，如数家珍。我想一个学校若不罗致几个人才做教授，结果必是一个大失败。我觉得清华应该特别注意此点。梦华告诉我，他们正在要求学校把张鑫海也请去，但因经济关系不知能成功否。下午梦华送我渡江，我便一直的北上了。我很感激梦华和张女士，蒙他们殷勤的招待，并且令梦华睡了一夜的地板。